

- 徐向前与陈昌浩
- 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概述
- 李鹏宜昌三峡行纪略
- 湖北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起步
- 我与《今古传奇》
- 武汉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的回顾
- 我在日军侵占当阳的日子里

二〇〇八年第二辑（总第八十五辑）

湖北文史

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 北 文 史

二〇〇八年第二辑

(总第八十五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文史. 2008 年第二辑(总第八十五辑)/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216 - 05836 - 0

I. 湖…

II. 湖…

III. 文史资料—湖北省

IV. 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2586 号

湖北文史

二〇〇八年第二辑
(总第八十五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文印中心

印张:7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175 千字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0.00 元

书号:ISBN978 - 7 - 216 - 05671 - 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时 代 追 踪

徐向前与陈昌浩	夏明星(1)
武汉会战概述	黄华文(34)
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概述	章戈鸣(53)
李鹏宜昌三峡行纪略	李 泉(78)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湖北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起步	陈丕显(93)
我与《今古传奇》	李传锋(112)
我所感知的湖北新闻与社会	蔡华东(121)

沧 桑 看 云

国民政府的考试制度	赵汝言(129)
川军在宜昌、沙市一带“围剿”红军的经过	罗君彤等(147)
对伪武汉绥靖主任叶蓬及其所部收编经过	舒靖南(162)
武汉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的回顾	吴世纬(166)

江 汉 寻 梦

北洋时期湖北税务黑幕	龚张斧(178)
活跃在宜昌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	何震东(188)
我在日军侵占当阳的日子里	赵春珊(198)

夏明星

徐向前与陈昌浩

楔 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同年4月,王明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来到鄂豫皖苏区中心——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河南新县),随即在第二次反“围剿”前线见到了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曾中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和军参谋长徐向前。

对于张国焘,徐向前可谓久仰大名:

张国焘,又名特立,1897年1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为“五四”运动骨干分子之一,参加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他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1月,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陈昌浩——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徐向前不识其人,也未闻其名,后来慢慢熟悉:

陈昌浩,曾用名苍木,1906年10月出生于湖北汉阳永安堡戴家

庄(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

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陈昌浩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到苏联,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共青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同样,对于纵横驰骋在鄂豫皖苏区的山西人徐向前,张、陈也是饶有兴趣,急于了解: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11月出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念过书,当过小学教员,1924年春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那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十几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学生们排好队,站在办公室外面,一个个叫进去,又一个个走出来。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对话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

蒋介石看看他,问道:“你叫什么名?”

答:“徐象谦。”

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人。”

问:“在家干过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是那样的机械和无趣。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校长,俨然像个法官;而不肯多吐露半句话的学生,简直像个被告。校长看着学生,学生立正站着,尴尬得无法谈下去。在蒋介石眼里,“徐象谦”是个“无出息”的学生,谈话没有兴趣了,他挥挥手,徐向前

转身走了出来。

蒋介石怎么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个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鄂豫皖的红军著名军事将领。

1927年3月,正是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却毅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担任由工人赤卫队整编成的红四师参谋长、师长,在“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下纵横广东海陆丰一年之久,并正式改名向前,寓意永远向前。

1929年6月,徐向前奉中央军委派遣,到鄂东北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率部接连粉碎敌“罗(霖)李(克邦)会剿”、“鄂豫会剿”、“徐(源泉)夏(斗寅)会剿”。同年12月下旬,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委主席。1930年4月,鄂豫皖苏区红军整编,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又整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军参谋长。3月上旬,他参与指挥双桥镇战役,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5000余人,这是红军首次取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大胜利。

初次见面,徐向前感觉到:能够年纪轻轻就曾到苏联学习过,并且能和张国焘联袂来到鄂豫皖,陈昌浩定有其过人之处。陈昌浩更是震撼:一个山西人不但能纵横海陆丰,还能跃马大别山,不愧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看走了眼!看来,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军事上潜力很大。

红四军南下之争——徐向前支持曾中生,陈昌浩襄助张国焘

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就召开会议传达王明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

鄂豫皖分局的职权,是直接代表王明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

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鄂豫皖所有红军和地方武装。张国焘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先到鄂豫皖并打出斗争局面的黄埔四期生曾中生，却仅仅担任军委副主席。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分局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下车伊始，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作了调整。旷继勋仍然任红四军军长，军委副主席曾中生兼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主力师，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军参谋长徐向前改任第十三师师长、红七十五师领导吴焕先，都是能征惯战之士。

1931年6月，鄂豫皖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曾中生、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人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张国焘也无异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7月上旬，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开会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时，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他要红四军兵锋指向皖西，先南下英山，再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徽省城安庆，威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限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即兵锋指向鄂东北，直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但张国焘固执己见，部队被迫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1931年7月中旬，张国焘为贯彻自己的意旨，对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让“沉默寡言”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8月初，徐向前、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就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

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却对下一步的行动忧虑起来。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

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原则问题上徐向前从不含糊。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一个师守英山，以两个师四个团出蕲春、黄梅、广济。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他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问题。红四军南下，真是难得的胜利！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9月初，红四军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

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1931年9月13日，陈昌浩到达红四军军部，宣布张国焘的命令：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向前、陈昌浩互有微词

陈昌浩一到任，就开始在红四军中“肃反”抓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战士，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8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9月15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现在被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人，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这件事在他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偶然看见队伍里有两副担架抬着人，他就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使，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了？

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鄂豫皖

土生土长的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对徐向前的不满和抗议，陈昌浩一直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这次他也抬高了嗓门：“肃反抓人，是我职权以内的事，况且这又是张主席的决定。”那时，党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1931年9月底，部队到达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形势逼人，徐向前只能忍气吞声。

1931年11月7日，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迎接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鄂豫皖红军整编为红四方面军，原红四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那一天，除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留在皖西活动外，红四方面军总部及各师部队都整整齐齐列队在黄安七里坪倒水河河滩上，接受年仅30岁的徐向前总指挥和年仅24岁的陈昌浩检阅。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陈昌浩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们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据《徐向前传》记载，“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焘有中央代表、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分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

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正是因为陈昌浩对张国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却在“肃反”问题上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所以徐向前愤怒不已。据徐向前回忆：“这年（1931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张国焘竟然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陈昌浩同志就更啰唆，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

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 徐向前、陈昌浩谋勇相济，心有灵犀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蒋介石集团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终因兵力不足，迟迟没能部署就绪。趁此时机，红四方面军采取进攻策略，开始南下作战，徐向前选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黄安城。

黄安城，是南线敌人离鄂豫皖苏区中心最近的一个重要据点，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之中。守敌六十九师战斗力不太强，屡遭红军游击袭扰，士气低落。但是，该师自到黄安城后修筑了许多工事，碉堡林立，防御体系比较完整。同时，黄安守敌还可得到麻城敌三十一师、黄陂敌三十三师、孝感敌四十四师的策应。对黄安这股敌人，实行强攻显然不行。经过深思熟虑，徐向前召开军事会议，

提出长期围困、逐步削弱、创造条件攻城歼敌的作战方案。会上,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昌浩认为:徐总指挥提出的作战方案,既可行,又稳妥;如果能全歼黄安守敌,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攻。于是,围困黄安的战役部署决定了,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1月10日晚。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在粉碎敌人两次增援、一次突围后,方面军总部决定12月22日夜間攻城。这时,陈昌浩表现出惊人的胆略。据徐向前回忆:“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教练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我们于1930年初在宣化店缴获的。……飞机运到新集后,命名为‘列宁号’。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27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这次,飞机到达黄安上空后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给他们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万万没想到,来的却是红军的飞机。撒了些传单,还丢了两颗大炸弹,搞得敌军愈加慌乱不堪。”黄安守敌遭“列宁号”轰炸后,更加军心不稳,红军一鼓作气拿下黄安。黄安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任方面军总指挥、总政治委员后攻下的敌整师设防的第一个坚固据点,是运用围点打援、运动防御与攻坚结合的成功一战。

1932年5月,徐向前、陈昌浩在安徽六安取得了“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大歼灭战——苏家埠战役的胜利,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年初,红军已经取得了黄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的胜利。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从皖西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敌人在苏区周围的兵力约10万余人,而红军只有近3万人。从兵员数量上看,敌众我寡;从武器装备上比,敌强我弱。怎么办?

1932年3月,大别山已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在六安独山镇,徐向前主持召开了有师长、团长和地方独立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条分缕析道:

六安苏家埠是敌人在皖西的前哨据点,敌岳盛暄四十师驻苏家埠。敌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的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起六安城,南至霍山,总共部署了6个旅12个团。我方面军总部的决心是:在地方武装支援掩护下,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包围苏家埠、韩摆渡和青山店,以“围点”为钓饵,把来自六安、霍山,以及合肥、蚌埠方向的援敌,诱到陡拔河以东一举歼灭。

但是,面对强敌,张国焘动摇了,不同意向皖西发起进攻。这时,陈昌浩的表态至关重要。晚年,亲历战事的开国中将徐深吉回忆:“陈昌浩政委看徐总胸有成竹,决心果断,就站在徐总一边。张国焘不得不收回自己的错误主张,同意徐总率师东进。”

1932年3月底,红军挥师将苏家埠、韩摆渡包围起来,一部直逼六安城郊。苏家埠西濒淠河,居民有1万多人,水陆交通比较方便,是六安西南的大集镇,皖西敌人重点防守的一个据点。苏家埠被围困成孤岛后,敌人的粮食越来越困难,敌师长岳盛暄天天向上峰告急。4月下旬,蒋介石任命其嫡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拼凑了15个团的兵力共2万余人,分两路由合肥向苏家埠地区进犯。

张国焘见敌人来的兵力比较大,又产生了动摇,提出要撤出苏家埠、韩摆渡之围,放弃快要到手的胜利。徐向前找到陈昌浩,向他分析:“敌人虽然有15个团的援兵,但其建制复杂,内部矛盾很多,除厉式鼎的第七师以外,各部都遭受过我军的严重打击,士气低落,而且又是远道而来。我军士气高昂,工事坚固,以逸待劳,等敌来攻,在运动中歼敌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因此,主张坚决

地打下去,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

徐深吉中将回忆:“陈昌浩同志支持徐总的正确意见,同意打,反对撤,张国焘勉强收回了他的错误意见。”徐向前也承认陈昌浩的态度极其重要:“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打!”结果,一切都在徐向前算计中,红军在陡拔河以东共计歼灭敌人3.5万余人,俘虏敌总指挥厉式鼎和5个旅长、11个团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获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飞机1架,解放了渭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鄂豫皖红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好的一次空前的大胜利。这样,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5月23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来电祝贺红四方面军取得苏家埠大捷,电报指出: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许多红四方面军老人都说,没有陈总政委的支持,就没有苏家埠大捷!

**徐向前、陈昌浩正确意见被拒,
张国焘落得一声哀叹:“不听徐陈言,吃亏在眼前!”**

1932年春,在国民党四大上,蒋介石特别提出鄂豫皖苏区的“危险”,决定将其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鉴于过去几次“围剿”作战指挥者不得力,蒋介石这次决定“御驾亲征”,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围剿红军的部署: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便于指挥,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汉口,下组左、中、右三路军。除了何成浚指挥的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苏区外,中路和右路军全力负责“围剿”鄂豫皖苏区。根据红军获悉的

情报,敌总兵力共约30余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

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迫在眉睫,徐向前、陈昌浩向鄂豫皖分局提出建议,红军必须立即进行准备,以对付敌人的进攻。然而,当时王明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却是:“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的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放,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作为鄂豫皖分局和军委会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更是被红军近年以来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现在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根据王明中央的训令,他提出红军当前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平汉路;第二步,沿平汉路南下,歼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威逼武汉。

1932年6月下旬,根据鄂豫皖分局的决定,徐向前率领红军主力由潢川地区西进,执行破袭平汉路计划。结果,仅仅攻下鸡公山,歼敌1个团。此时,红军已连续作战7个多月,部队十分疲劳,而且病号日增,战斗力显著下降。因此,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向鄂豫皖分局建议,停止在平汉路的作战行动。6月底,张国焘在黄安县城西北的小镇夏店召开鄂豫皖分局会议。会上,徐向前再次提议: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休整训练。从目前的情况看,敌人的行动还只是在边沿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的进攻活动,我们可以用一部兵力警戒敌人,主力放在鄂豫皖边界地区,一脚踏在苏区,一脚踏在白区,一面休整,一面掩护地方开展工作,开辟新区,巩固老区。同时可以就食新区,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陈昌浩表示支持。

可是,张国焘和沈泽民对迫在眉睫的“围剿”仍然漫不经心,反对红军进行休整。沈泽民竟然说:“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